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古典与现代

CLASSICAL
AND MODERN

(第一卷) 主办 海南大学 主编 杨国良

特稿 杜维明 张丰乾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文学科方法论/游学天地 车槿山 巴黎笑谈：要饭与文学/思想边界
十翼 人生那平静而悲伤的音乐/杏坛之声 张志扬 启蒙：落日前的凭吊/洪子诚 八分钟的发言/凿壁偷光 陈刚
朝向古典高度的仰望/逝者生存 赵越胜 那不就是昨天吗/刘小枫 萌萌三年祭/艺术春秋 吴兆基 太极拳与古琴/
杂树生花 耿占春 沙上的卜辞/心眼回眸 陈思和 自己的书架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典与现代

(第一卷)

CLASSICAL
AND MOD
主编 杨国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与现代. 第一卷/杨国良 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5633 - 9220 - 9

I. 古… II. 杨… III. 人文科学—丛刊 IV. 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2532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责任编辑:杨志友 余 红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 × 960 1/16

印张:12.5 字数:130 千字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卷首语

终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诞生了!

《古典与现代》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期盼,而真正的古典离我们实在太久远,几成绝响。离得远就更有拉近、打通的必要,尤其在喧嚣、嘈杂之时。

人始终需要从自然中获取灵感。灵性之所以日渐枯萎,是因为人们常常在忙碌中渐渐与自然隔绝。真正健全的读书人与天地契合,享受孤独,吸其精华,刨根究底。精神呼唤回归,让我们一起怀念那健康自然、富有朝气和创造力的身心一体的生活。

人类原本不分文武,原本文史哲一家,原本上下左右交融;心灵本该丰富多彩,本该兼容并蓄,像不同声部的大合唱,像美轮美奂的交响乐。

我们看重心性,企图“接气”:接民族之气,接异域之气。

当世界大都醉心于功利实用的时候,应该有人像柏拉图、荀孟一样始终记得申辩与传道,不致让历史的精魂失传。

人类“纯洁的守护者”“灵魂的守护者”曾以高贵、优雅和活力面对无常生死、苦难邪恶,值得后人仰望,由仰望变成对视,与古典心灵的对视。

古典之旅成了朝圣之途。

好在文化、教育原本不是一人之事,一天之事。

《古典与现代》编辑部

2010年1月

目 录

杜维明 张丰乾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文学科方法论 / 001

游学天地

车槿山 巴黎笑谈

——要饭与文学(旅法札记之一) / 018

周伟民 唐玲玲 飞向夏威夷

——寻找“他山石” / 021

龙彼德 灵魂的云游(上) / 025

胡 适 1911 年留学日记摘抄 / 035

思想边界

十 翼 人生那平静而悲伤的音乐

——关于灵魂及文人的事情 / 037

耿开君 大学,这仰望之地

——海外校训三则 / 046

杏坛之声

张志扬 启蒙:落日前的凭吊

——为“五四”九十周年而作 / 051

洪子诚 八分钟的发言:文学的焦虑症 / 063

杨振铎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附:太极拳大家谈” / 068

凿壁偷光

陈 刚 朝向古典高度的仰望

——对布瓦洛《诗艺》的思考兼导读 / 073

[法]尼古拉·布瓦洛 《诗艺》(第一章) / 084

[美]盖尔·艾科夫 领先于西方的辉煌

——序《中国古代诗词选中英文赏析》 / 096

[德]特拉克尔 死亡的七首歌 / 103

逝者生存

赵越胜 那不就是昨天吗

——给萌萌远行三周年 / 105

刘小枫 萌萌三年祭 / 107

张志扬 “人是有可能死于羞愧的” / 109

萌萌 《命运》：临终前在病床上用沙哑的声音背诵的诗 / 113

野 叟 和刘培元老先生悼亡七律一章 / 117

宋耀如 1884 年 4 月 24 日给安妮的信 / 118

艺术春秋

吴兆基 太极拳与古琴 / 121

郭 平 聆听刘景韶先生 / 129

刘云卿 多伦多的隐匿者

——格伦·古尔德的孤寂与永生 / 135

杂树生花

耿占春 沙上的卜辞数则 / 140

周桂钿 古贤之教化

——西汉的疏广和东汉的王符 / 146

张江南 读马基雅维里的《论李维》札记(节选) / 147

林 秋 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 / 152

秋叶辑 学林散叶之“为而不争” / 153

心眼回眸

陈思和 自己的书架

——《当代小说阅读五种》作者自序 / 154

耿开君 往日时光

——邵庆元先生 Auld Lang Syne“友谊地久天长”古典译词 / 159

宋石男 张献翼：狂颓于万历年间 / 164

李小均 科利奥兰纳斯之死 / 174

凌 越 爵士时代的幻梦 / 181

李文粹 那些花儿 / 189

主编手记 / 194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文学科方法论^①

杜维明 张丰乾

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几个可能

张：杜先生，人文学科的方法论问题，讨论很久了，因为这似乎是我们传统中比较缺乏的部分。现在很多学者重新开始关注这个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围绕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召开了几次国际会议，比如西方挑战与中国回应、经典诠释的不同向度、格义与反向格义等。相对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杜：现在在人文学方面，有一个思潮值得注意，就是关于诠释学的兴起。西方人文学的发展是和诠释学密切相关的。而研究中国人文学的学者比较关注的是关于经典解释学的问题，我觉得这是要特别寻求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另外，台湾“中研院”的文哲所，^②从筹备到成所，当时讨论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应该是什么，大家一致的看法是经学，经学传统当然和诠释学有密切关系。到底将来会不会发展出完全是关于人文学的，和自然科学方法完全不同的方法，这中间有一个线索。

十八世纪以来，因为科学理性越来越强，有些学者，比如意大利的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和德国的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提出人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后来，C. P. 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① 本次访谈在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办公室进行，由张丰乾执笔整理，并经杜维明先生本人审阅校订。本次发表新增了小标题，补充了部分资料，并改正了个别错别字，部分文字的顺序也做了调整。采访者以为特别重要的内容，则以黑体字标出。

② 杜先生长期担任该所学术委员会的召集人。

1905—1980)发表过著名的谈话,突出人文学和科学的冲突问题。这中间例子很多,你们应该很了解。在文学、历史、哲学的研究中,观察者和参与者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自然科学的研究,不需要认同他研究的细菌、分子结构等;但在人文学方面,对于研究对象的认同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讨论过的“体知”的问题。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提出“默会之维”(tacit dimension),他认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也必然是有的,不可能只有完全是外在的知识。这样说来,自然科学和人文学在认识论方面,从经验和体知的角度,是可以沟通的,并不是不相干的。在美国学术界,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越来越自然科学化,越来越注重量化和分析,越来越注重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分离;同时,自然科学的方法也渗透到人文科学。但这是不是唯一的途径,还可以考虑。事实上,另一方面,人文科学的具体化、时间性、不可重复性的方法,也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参照。我觉得由此可以逐渐地讨论人文学的方法论问题。

现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有一种情况需要破除,就是还没有达到理论分析的水平,没有达到学术规范,而拒绝论证、说明和辩难的主观臆断。另外一面,即使是不能量化的、个体性的、超越性的、不可言传的内容,也要尽可能地给予证明、解释和表达。

张:方法论的意义在于它的普遍有效性,但是在人文学科,特别是中国思想与文化方面,有人认为实际情况是“法无定法”,或者说,所谓方法实际有很强的个性特征,所以还是古代那种“秘传”的方式比较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杜:要注意个人的(personal)和私人的(private)之间的区别。我每次在英语世界里作如此分疏时,都会引起共鸣。“隐私”是任何外力,包括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权侵入的。而个人或者个性化的方法,和“隐私”不同,个人有很深感受的方法,恰恰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而且还有成为公共资源的可能。所以,首先要超越主观主义,不能把学术研究私有化,这是最重要的方法。但是要建立主体性和客观性,主体性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主体性、客观性、超越性联在一起,是儒家的老传统。再考虑一下“体知”,实际是经验之谈。

我原来和日本学者源了圆关于东方宗教有一次长谈。希腊哲学中有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分野,思辨理性强调分析、论证和表达,实践理性强调身体力行、心领神会,但是这里面有差别,举例来说,知道自行车的机械结构和会骑自行车的专家,完全不可类比,前者是专家,后者是普通人。在东方宗教当中,怎样把一个原来是只有体验、冥想的精神修炼用精致的语言或符号表达出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想,即使要体会那些“不可言传”的内容,也要经过严格的方法论的训练,这样可以使那些“秘传”的知识尽可能讲出来,讲清楚。

学术职业与学者品位

张:这可能是您经常被问及的问题。作为现代学术研究对象的儒学是历史上的儒学,这方面的研究是纯学术的,但同时儒学又应该是当下华人世界基本的价值源泉,应该适应现实需要,儒学及儒学研究的这两方面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无紧张和冲突?您如何理解或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杜:一方面学术职业化是大潮流,比如,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指出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教授和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物完全不同,这个潮流难以阻挡。所以,只要在学术界做研究,大概都要满足学术机构所要求的基本条件,也就是最低要求。最低要求的背后还有很深的意义,很深的意义在于要从这个最低要求出发,慢慢要深化,慢慢要细致,慢慢要和你的生活相脱离,做纯粹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和你的道德素质没有关系。我觉得其中有非常健康的方面。你想想,学术的政治化,学术的道德化,学术的感情化,都是不健康的。所以,学术的职业化,注重学术素养、学术规范,我非常赞成。这个潮流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什么可质疑了。在美国,一个学者的聘用、升职,唯一的标准是看他已有的或刚刚创发出来的学术成果,而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其他的因素如果带进来就没完没了了。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非常值得注意,就是一个完全技术性的学者,和一个有创意的学者,有领导能力的学者,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在哲学领域,有些学者强调“品位”(taste)。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提出了 edifying conversation 或 edifying philosophy 的问题,我不知

道用中文怎么准确翻译,就是有启发性、可以受用的谈话或叙述是学术和思想诞生的重要途径。所以,学术界内部的高下判断是有很多途径的。一般认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善于钻营的、急于事功的、完全不顾大环境的学者,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成功,也不会有大的成就。而那些大的学问家、科学家,可以和最好的文学家对话。大的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素质也都是很高的。

关于儒学的研究者和他自己的形象与社会上关于儒学的印象和儒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德行方面为人们所不齿的人,他在学术上也做出成绩,比如可能在《易经》的解释和处理其他复杂的学术问题方面有所建树,也值得注意,你不能说他很坏就否认他的价值。另一方面,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其他,基础的问题还是做人的问题。但是,问题也比较复杂。这样的例子很多,学术界也一样。另外,学术界越来越和社会生活分离,形成了他自身的逻辑,在广义上,都应该鼓励。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倪德卫(David Nivison)原来是学哲学的,在分析哲学方面很有造诣,他关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也很有影响。但是,他也是以固执出名,连最亲密的学生对他的观点提出异议也不能容忍。1983年,他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发表一篇长文,提出武王伐纣的年代是公元前1045年,这是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推算出的。文章被接受发表以后,他一天到晚给编辑打电话,以至于编辑忍无可忍才罢休。没过多久,他又提出武王伐纣的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040年,而他的学生班大维(David Pankenier)提出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后来李学勤他们的夏商周三代工程从多种角度推算出的武王伐纣年代也是公元前1046年。但这些都不意味着他的执著没有价值,他的研究没有贡献。实际上,从考古断代的角度,即使按照他讲的公元前1040年,和公元前1046年其实是非常接近了。

西方理论与本土资源

张:儒学是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特别是中国哲学免不了要透过西方哲学的概念、理论框架和思考模式来观察中国哲学的内容,有些是牵强附会甚至扭曲变形,有些则带来思想的火花和新的启示,这

不同结果是如何发生的？二者的结果不同是否因为方法的不同而造成？如何避免不好的结果？如何获得最积极的成果？

杜：不仅儒学如此。好几代，特别是五四以来，学术界乃至中国文化界的知识结构中，西方的文化因素已经很浓厚了。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很多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而言，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海外汉学界所确定的。在哈佛，研究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学系，都是使用该地区的语言教学和写博士论文。而一些研究中国思想的外国学者，虽然对古汉语有深刻的研究，却不能用中文口语交换学术观点。我在柏克利(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时有一位同事，叫谢弗(Edward Schafer, 1913—1991)，^①他是研究唐代很著名的汉学家。我曾经问他有没有兴趣去中国访问，和中国学术界交流，他说，“交流”？我的唐代就在楼上——他的书房，他对于当代人的成果完全没有兴趣。我想这是不合情、不合理的，但这个情况正在改变。我期望美国的汉学研究和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和美国的日本研究一样，主要的议题都由我们来确定。国内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另外你们这些既熟悉本国资源，又知道国外情况，“知己知彼”的学者越来越多，假以时日，或长或短，情况会改变。

但是，也要注意方法论的“自我反思”，越是意识到自己方法论背后有一系列“预设”，越是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扎实、深刻。同时，也要自觉意识到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一项“共业”，那当然要遵循客观的标准。西方汉学家的方法很多还是值得借鉴。比如，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关注于地理和名物的考证，就是要落实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具体时间。这些问题在中国学者看来可能很不重要，但是他有钻研的精神，做一些非常细致的工作，完全是出于兴趣。

张光直(1931—2001)先生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任何考古学的理论，都要经过中国材料的检验，这一点大家比较认可；另外一个说法是，中国学者要有国际视野，中国的学术成果要得到国际的承认，就必须用英文发表，才有更多

^① 或译薛爱华，感谢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教授校对英文拼写。

读者,这一点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也不要忘了另外的例子,就是一些很优秀的中国学者的英文成果在西方影响很大,而在中文世界不被足够重视。比如,刘若愚(James J. Y. Liu, 1926—1986),长期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关于中国文学,特别是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但是中文学术界,还是仅有专业人士知道一些关于他的成就。

所以,我们在哈佛—燕京社提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就是希望有一些学者,他们的研究非常专,他们的方法很精到,精到的意思是,他处理自己文化传统中的问题,和他的研究对象有很好地配合,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的大理论。这些工作做得非常细,非常好,但是在做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又能从更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的成果的解释力不再局限于地方知识,而是可以扩展到更宽广的领域。比如法国的年鉴学派,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关于法国或者欧洲中世纪的,但因为有很好的方法,所以在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目前,具有普世意义的学术,大部分是来自西方的,开始从巴黎、从伦敦、从柏林、从康桥,然后大家都在讲。我们期望,最起码在21世纪,有来自香港、广州、北京、上海、济南和其他中国地区的学术成果,因为有很深刻的意义,可以成为全球范围的知识。这是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

学术立场与知识分子

张:您一方面是教授、学者,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华语知识界对您的期待其实也各有不同。我听说香港有几位知名学者,陈方正、金观涛和刘青峰,曾请您在中文大学附近的一家会所吃饭,说知识界对您有很高期望,但是您认同儒家思想,比较可惜,希望您能放弃。他们是不是希望您成为社会领袖?另外,您自己以不同身份撰写文章,组织学术活动,有没有构思或表述方式的不同?

杜:是的。他们在很好的地方请我吃很好的饭,倒不一定是希望我在社会上发挥什么作用,而是觉得我思想开放,但是认同儒学,有些抱残守缺,如果放弃儒学,会在学术界、思想界有很大贡献。我说其他都可以考虑,这一条不行,我从十四五岁就对儒学有感情,现在成了看家本领,如果放弃了,即使有很大影响,也没什么“功”可言。

我们刚才谈过,在学术界需要遵守一些基本的要求,这些要求很严格。美国的大学教授分别有研究、教学、学术行政和社会服务的职责,你可以选择各个方面在你的工作中所占的比重。知识分子就是以从事社会服务为重。当然,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要求。一些推行精英教育的学院(college),主要看重教学,而柏克利、哈佛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则突出研究,如果你教学很好,在公共领域影响很大,但专业研究不突出,基本上是被排斥的。有一个最有趣的例子: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在哈佛当校长的时候,找一位名叫维斯特(Cornel West)的教授谈话,说维斯特整天在外面演讲,甚至发行CD,虽然也被人研究,但是有些不务正业,应该专心研究学问,以使“哈佛教授”名实相符。结果维斯特反应非常强烈,公开抨击萨莫斯歧视和侮辱他,然后愤然离开哈佛,去了普林斯顿。维斯特是在社会上非常有影响的非洲裔思想家,本来萨莫斯的前任陆顿斯坦(Neil L. Rudenstine)花了很大力气,在哈佛组建了以亨利·盖茨(Henry Gates)为核心的 Afro - American Study(非裔美国人研究)的 Dream Team(梦幻组合),结果不仅维斯特走了,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学者阿培(K. Anthony Appiah)也走了。

研究型大学毫无疑问要以研究为主。但是学术界的知识分子还是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因为在学术界,你做得再好,一般的知识界、媒体、政府和社会大众很难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一定要有一批人,他们对学术界的研究非常熟悉,又接触很多其他人士,可以使学术界和知识界、文化界有很好沟通。我做了这样一个区分,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三者之间的互动是很密切的。在健康的情况下,学术界的深刻研究使得知识界的水平提高,知识界的水平提高可以使得文化界的品位提高。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文化界的庸俗,直接干扰知识界的水平,使之浮躁;知识界的浮躁,直接干扰学术界的尊严,使之堕落。另外也不要忘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分别,比如,工程学和技术研究与政府、企业的关系太密切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 1890—1969)曾经讲美国的实力来自军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联合体,原来还把“学术界”包括在内,但是他的学术顾问坚决反对,说这样是糟蹋学术界,所以才有“军工综合体”(military - industrial complex)的说法。

在学术界,包括人文学科,也必须有一批人安心从事精深的研究,如果学术界以培养知识分子为目标,或者大家都争做知识分子,那就完了。但是,要培养条件,使那些专家能顶得住社会上的诱惑和压力,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就需要知识分子面向社会,满足知识界、文化界和社会大众的需求;同时,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可以和知识界的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界、企业界、政府的知识分子横向沟通,这对社会的民主化非常有好处。所以,学术界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应该互相欣赏,有健康的互动。哈佛最好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都有一些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也有的学者,比如奎因(Willard Van Quine, 1908—2002)坚持纯粹的哲学研究,尽量避免和社会现实发生关联,包括对越战也不发表意见,但是他也得了很多哲学的大奖。这两种取向之间应该有良性的互动。

反思“双语”

张:您一方面用英语为西方读者写作,一方面用中文为华人世界写作,两种写作的主题、构思、布局有何相同或不同吗?对双语写作您有何切身体会?对于要用双语的年轻一代,您有何忠告?

杜:有人认为儒学的原汁原味的思想和价值不能和汉语,或古代汉语相分离,目前在东亚是这样的。这和《圣经》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没有要求你懂得希伯来语或拉丁文才能读《圣经》;读希腊哲学,也不是一定要懂希腊文。美国大学里面哲学和古典学的研究是分开的,研究古典学则需要懂希腊语。诺思本(Martha Nussbaum)在古希腊罗马经典和哲学方面都很有造诣,但是她在哈佛任教时受尽歧视,研究希腊古典的和研究希腊哲学的专家都不看好她,她没有拿到终身教职,后来去了布朗大学,现在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是顶尖的希腊思想研究专家。所以,学术评价的事情往往是比较复杂的。

我跟你们谈到过,有一次在新加坡,李光耀问能不能用英文讲儒学,我说“能”。这里面牵涉到我所讲的儒学发展的三期说,儒学从曲阜到中原,从中国到东亚是前两期,儒学的第三期从东亚到世界能否实现,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考验,能不能用英语讲儒学经典,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关键。《可兰经》

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刘智(介廉,约1655—约1745)在十七八世纪用汉语和中国的学术传统来介绍和解释伊斯兰教的经典,造诣非常高,所以汉语也可以成就伊斯兰神学,他的著作我们翻译过来了,即将在哈佛出版社出版。

“双语”不是中英文互译。我自己演讲或者写作,从构思到成篇,是英文就用英文,是汉语就用汉语,我从来不翻译自己的作品,翻译不如重写。有的学者没有母语,但会五六种语言。另外,很多国家是几种语言并用的。所以“双语”不是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要把“外语”变成和自己母语一样熟练,是比较困难的。我自己的英文也花了很长时间,现在对于美国的球赛报告、非常快的流行歌曲和一些笑话,还是有隔膜;另外,如果要我写小说,估计英文不行,中文也不行。所以,语言是活的,要当成“日课”,每天都接触、练习,但不要看成负担。

1980年,我刚四十岁,在意大利科木湖(Lake Como)开会时,陈荣捷(1901—1994)先生跟我说,他有两个建议:一是希望我放弃英文,用中文写作,他说他自己的中文文章很多人看,英文文章反应不太大;二是希望我从那时开始不要旅行,每年专心写两篇文章就可以了。我当时就告诉陈先生,这两个建议都难以接受,这和我的学术取向有关。我在美国大学教书,不用英文写作,总觉得有些“隔”。杨联陞(1914—1990)先生的英文非常典雅,但是他在晚年身体不太好,六十岁以后几乎全部是用中文,他说年纪愈大,愈有回归中文世界的念头,自觉英文并没有进入他的生命。这种例子很多,和个人的选择有关。

而要保持双语,会有困难,我自己也有失败的教训。从美国第一次回台湾,我发现中文明显退步。所以,回来以后在普林斯顿教书,我下决心中英文同时使用。我坚持记日记,日记基本上是用中文,这是一种磨炼。后来有很好的分工,感情的文字都用中文,学术的文字都用英文。1980年代和大陆学术界接触以后,中文的学术作品越来越多,平衡完全被打破。

另外我提一点,英文的学术写作,没有例外,都要经过很多修改,自己修改,编辑修改,远不止“三易其稿”,写成的时间和修改的时间差不多一样长。而我的中文文章则发得很快。我的文集当中有我自己写的,有讲话,有对谈,实际上是有一大批作者。有些学者对自己的文字很执著,一字一句不能动。

我觉得信息的传播是这样的,常常讲出去的,不一定是信息,听进去的才是信息。我希望大家帮我改,有些改得确实比我自己写得好。我有两个经验,在印度发了一篇文章,我还帮他们改了,结果发表以后还是错误百出;而在日本《东方佛教》发的一篇文章,很久没有和我联络,我很担心,但是发表以后发现校对很仔细,错误很少,我很感动。我最早在国内发的文章,是讨论“仁”的问题,庞朴先生约的稿,那时候责任编辑非常敬业,确实是负责任,文稿发表以后我发现只有一处改动,那是我自己的笔误,没有其他错误。所以最好的情况是中英文融通互补,最糟的情况是中文不是中文,英文不是英文。

张:与此相关,很多中国哲学的范畴能否和怎样翻译成外文,特别是英文,也是一个讨论的问题。比如,关于“礼”,您提到就有 ceremony, ritual, rites, propriety, rules of propriety, good custom, decorum, good form, natural law, 等等。这些不同的翻译,是不是由于不同的方法论所导致的,您所接触的西方学者,他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杜:最近白诗朗(John Berthrong)他们用“civility”翻译“礼”。美国著名的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理论家希尔斯(Edward Shils)为我们“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学传统”的学术会议写过一篇文章。他的核心思想是 civil society,翻译为“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影响非常大。civil 的原始意义是“非野蛮的”、“非武力的”、“非官方的”,这些都是“礼”的固有内容,当然不能认为官方不需要讲“礼”。希尔斯认为孔子的思想为现代的公民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甚至认为是开创者,这对很多中国学者来说是天方夜谭,但一些西方学者接受他的观点。

你刚才提到的那些翻译“礼”的词,都是“礼”的内容,但是“礼”的内容又不是上述任何一个词可以单独概括的,所以大家都不满意。哈佛宗教委员会后来又举办了“关于礼的再反思”的系列演讲,我指出:用“ritual”来翻译“礼”,会使“礼”的内容贫瘠化,但是用“礼”来翻译“ritual”,则使得“ritual”的意义丰富很多;用“love”来翻译“仁”,也是这种情况。有一些词的翻译会使得原来的语义丢失,但是,另外的情况下,则可能因为翻译而把原来语词含义的丰富性表达出来,比如,我讲过“情”,翻译为 feeling 和 emotion 两个层面是

一种很好的区分,feeling 是比较深层次的情感,而 emotion 是很表面化的情绪,说一个人 emotional,是一种贬义,说明他是情绪化的人。

当然,有一些词是不可翻译的,或者不用翻译。我主张每一个文化和思想传统当中都有一些代表其核心价值的语词,而且这些语词代表了这个文化的固有特色,不仅如此,其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历史渊源,对这些语词,最好不要翻译。比如中国的“道”,已经进入英文,不用再翻译成“the Way”。我们主张,中国哲学中的一些基本的词,不要再翻译,而是直接用汉语拼音,当“礼”和“理”同时出现的时候,可以用 Li(1)、Li(2)结合汉语注释这样的形式来表达,已经有不少学者这么做了。另外,翻译可以促进对于本国语言的深刻理解决,没有翻译,对本国语言的特性不会很敏感。萧绎、沈约等人对于汉语特性的深刻认识,和当时的格义活动没有关系是难以理解的。

以《中庸》研究为例

张:能否结合您的具体著作来使读者更加了解您的工作。比如,您在1976年出版,1989年再版的《中与庸》(*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一书,估计可以称作您的成名作,在美国学术界影响比较大,据说是当时那一套“亚洲和比较哲学”丛书当中最畅销的一本?

杜:是的。那是一套专论(monograph),比专著部头小,但是比一般的论文长。他们用那本书的版税,后来又出了其他几本书,他们觉得有一些过意不去,让我把版权拿回来,在纽约出版。那本书是用一个暑假写的,从君子、社群和道德形上学的角度阐释《中庸》,后来再版时又加上了儒学的宗教性。写作之前,我看到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翻译的《中庸》,第一页发现“个人”、“伦理”、“社群”三个词,我很惊讶,和我想的一样,我想他要是写了,我就不用写了,但是再往后翻,就这一页,没有任何发挥。

张:您以“Centrality”阐述“中”,以“Commonality”阐释“庸”,虽然也用“Self watchfulness when alone”解释“慎独”,但是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和开放性。这些用词有没有特别考虑?